

文化哲学:现代性研究新视域

启蒙的意义与现代性的合理性

——福柯的“现代性的态度”

陈嘉明

(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厦门361005)

摘要:福柯将现代哲学的本质视为对“什么是启蒙”这一问题的回答。从根本上说,他对启蒙所持的是一种肯定的态度,认为它对当代哲学具有根本意义。福柯把他的“现代性态度”归结为一种“哲学的质疑”,亦即“批判性质询”的品格。虽然他不满足于“理性”的专断,对它的压制非理性有着尖锐的批评,但仍肯定理性所具有的“自我创造”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体现在科学文化、技术装备、政治组织等方面的“合理性”形式。

关键词:福柯;启蒙;现代性;合理性

作者简介:陈嘉明(1952-),男,福建闽侯人,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西方哲学、知识论、现代性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565.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6)03-0046-05 **收稿日期:**2005-12-15

福柯哲学为人们所熟悉的方面,是他对现代社会的知识状况与人的状况的揭示与批判。实际上,福柯对于启蒙与现代性所持的在根本上是一种基于辩证分析基础上的肯定的态度。他一方面讲述启蒙并未使人类步入“成年”的道理,并以继承启蒙运动的质疑与批判的精神为己任,坚持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以此来探寻、追求自由的“新的原动力”^{[1](P437)};另一方面他也积极肯定启蒙与现代性的意义,反对简单否定现代性的合理性的做法,宣称现代性的合理性形式不仅没有崩溃和消失,而且新的合理性还在继续产生。

一、启蒙的意义与现代性的态度

在福柯看来,“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在现代性问题中具有根本的意义,这一方面是由于历史的进程本身使启蒙重新成为“当代关注的中心”,这一进程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是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政治决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次是社会的“革命”史本身,它与理性主义

的哲学有关,因为自从18世纪以来,整个理性主义就怀有这种“革命”的希望;最后,是在殖民时代终结之际,一场责问西方世界的运动开始涌现:西方的文化、科学、社会组织以及最终它们的理性本身,有什么权利要求取得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有效性,正是历史发展所带来的这三方面的问题,使得在历经两个世纪之后,“启蒙又回溯了”^{[2](P452)}。

此外,启蒙在现代性问题中之所以具有根本的意义,另一方面还表现在它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决定着“今天我们是谁、我们思考什么、我们做些什么”,即决定着现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与道德实践的关键问题。正因为如此,在福柯看来,现代哲学在本质上“就是这样一种哲学,它正试图回答这两个世纪前如此鲁莽地提出的问题:什么是启蒙?”^{[1](P422)}在这里,福柯从根本上把现代哲学归结为对“什么是启蒙”这一问题的问答,可见此问题在福柯心目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此外,他指出这一问题所具有的难度及其重要性,这表现在

现代哲学虽然对此“一直无法回答,但也从未设法摆脱”,因此在两百年的时间里,这一问题不断地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从黑格尔、尼采、马克思,直到霍克海默和哈贝马斯。不过,在福柯看来,遗憾的是这些大哲学家们都未能成功地回答这个问题。正是鉴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福柯本人专门写出《什么是启蒙》一文,试图加入这一诠释者的行列,作出自己的解答。

在进行这一回答的时候,福柯把关注点投向了康德的文本,因为它有着一些值得注意的“原因”,这特别表现在康德在对其时代的反省中,采取了一种与其他哲学家不同的方式,即并不试图在一个“整体性”的或未来结果的基础上理解其时代,而是在“寻求差异”,寻求是什么差异使得今天与昨天不同。之所以这么说,是由于在福柯看来,康德之前已有的对现时代进行反省的三种形式:要么将现时代归属于现存世界的一个特定时代,它与其他时代的区别在于自身所具有的一些内在特点,有如柏拉图所做的那样;要么试图在自身中对正在到来的事件所显露的预兆进行辨认,以此来把握现时代,像奥古斯丁的做法那样;要么把现时代理解为朝向新世界降临的“过渡时刻”,如同维柯在他的《新科学》中所描绘的那样。康德与这三种思考现时代的方式不同,他是从时代的“差异”中来把握时代的差别,因此福柯认为,康德的文本“构成了一个新的问题”^{[1](P423)}。

福柯具体分析了康德这一不同思考方式的体现,这就是,康德界定启蒙的方式并不是正面加以定义,而是采取一种否定性的方法,把启蒙看作是一种“出路”,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把人们从由于无法运用自己的理性而陷于盲从的某种意志方面的“不成熟状态”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对于康德而言,启蒙的本质在于唤醒人们大胆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敢于去认识,而不臣服于任何权威,以此来摆脱思想与意志方面的蒙昧状态。福柯并且注意到康德对理性的“私人运用”与“公共运用”的区分,前者指的是某人作为社会的一个特定角色,如士兵、纳税人、教区负责人等,运用理性来追求某种特定的目的和结果;后者则指的是某人摆脱了这种特定的社会位置而纯粹作为人类的一员,亦即站在人类的立场上“为理性而理性”地思考。启蒙之所以能够发生与存在,一个重要的思想条件就是理性的这种公共与自由的运用。

从根本上说,福柯对启蒙所持的是一种肯定的态度。他赞许启蒙是一个在欧洲社会发展的特定时刻中所发生的“将真理的进步与自由的历史

相连接的事业”^{[1](P434)},是历史上发生的一组政治、经济、体制的和文化的事件,包含着社会转型、政治体制的类型、知识的形式、实践与合理化的方案,以及技术的变化等多种因素。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决定着我们的生活。此外,从哲学的角度看,启蒙“对当代哲学具有根本意义”^{[2](P451)},它为我们的哲学思考提供了问题,并规定了一种相应的哲学思考方式。

福柯进而诠释启蒙的精神实质,并把康德的启蒙思想誉为“现代性态度的纲领”。他认为找出这种现代性的态度有其重要的意义,它比起努力去区分“现代”与“前现代”或“后现代”来说,是更为重要的事情。这里所谓的“态度”,福柯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作的自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它有点像希腊人所称的社会的的精神气质”^{[1](P430)}。

福柯还以波德莱尔为例来说明这种所谓的现代性的“态度”。在西方社会,基督教的世界观把上帝创世与人的救赎、归返天国作为一种永恒,这就既把永恒建立在过去,同时又把它建立在来生,而唯独不建立在现时之上。但实际上对人而言,享有现实的人生才是最珍贵的东西。波德莱尔一反传统对于永恒的看法,强调一切基于瞬间,将当下现时的瞬间视为唯一可珍贵的东西。他认为倘若离开瞬间,一切永恒都是虚假的、毫无意义的。福柯就此指出,当波德莱尔把现代性定义为一种“短暂的、飞逝的和偶然的”全新感觉,一种与传统断裂的感觉时,就属于这样一种有关现代性的“态度”。

不过,与波德莱尔不同,对于现代性的“态度”或“气质”,福柯从根本上说认同的是它的“哲学的质疑”,亦即“批判性质询”的品格^{[1](P431)}。这种哲学的态度或气质乃是根植于启蒙的,而这正是福柯所要强调的。在他看来,这种质询使得人与现实的关系、人的存在的历史模式和作为自主性的自我的构成作为问题进入哲学家的视野,成为哲学反思与批判的对象。有鉴于此,福柯强调,我们应当从启蒙中继承下来的精神财富,或者说能够连接起我们与启蒙的共同的 attitude,正是这种对时代进行永恒批判的哲学气质,而不是去忠实于某种信条。特别地,他提出必须从“‘支持或者反对启蒙’的智性敲诈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反对对启蒙采取一种非此即彼的片面态度,而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对启蒙的精神实质怀有正确的认识,重在承续发扬它的质疑与批判的精神。

福柯并且把这种哲学批判的精神气质概括为一种认识到某种“界限”的态度。在他看来,批判乃是由“对界限的分析与反思构成的”^{[1](P437)},虽然对他而言,今天批判的实践面临的是与康德不同的界限问题,也就是说,康德所要划定的是经验科学的认识界限——现象世界,而福柯所要辨明的则是批判实践的界限——“它不再是寻求具有普遍价值的正式结构,而是对一些事件的历史性探讨”^{[1](P437)}。这意味着批判的目标不是去制造形而上学,不是去寻求确认一切认识的、道德行为的普遍结构,而是去质询将我们的思想与行为同历史事件连接起来的那些话语的具体实例。

福柯所说的这种批判的实践,意指自己的“谱系学”与“考古学”的研究方式。他指出,谱系学是在“构思”的意义上的,而考古学则是“方法”意义上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谱系学的方法乃是一种“能够阐明知识、话语、客体领域等事物之构成的一种历史形式,它无需参照某个主体,不管这个主体超越了事件场,还是顶着空洞的自体贯穿于历史”^{[3](P434-435)}。它着重于把握事物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权力与知识、主体、自我之间的关系;具体说来,即权力之网对于知识、真理、主体的支配、控制关系,而不是像以往的主体哲学那样,需要依据某种先验的“主体”概念,以之作为根本的参照系来把握知识、真理与主体等。

与谱系学不同,考古学方法的特征在于:其一,它是历史的,设法得出的是使我们的所思、所说、所做都作为“历史事件”来得到陈述的那些话语;其二,它是探求规则的,以类似于康德问题(纯粹数学、自然科学何以可能等)的方式,旨在探究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即支配我们思想和话语实践的各种生产法则和转换法则是什么,虽然这些法则属于“知识的积极无意识”的东西,我们未必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在这方面,考古学的研究“并不设法得出整个认识的或整个可能的道德行为的普遍结构”,而是设法得出作为历史事件而得到陈述的那些有关思想与行为的话语^{[3](P539-540)}。

不论是考古学还是谱系学,福柯声言他的这些研究方式所追求的目标完全是非形而上学的,或者说,他所持的是一种历史的、批判的态度,它属于实验性的,是通过现实来检验的。反之,假如想脱离当代的现实而去构想、制订出有关某种社会、思想、文化的整体方案,这种做法只会导致“最危险的传统的复辟”^{[1](P438)}。福柯的这些说法正是他自己的思想方式的理论总结。在他的学术研究生涯中,他确实是不作抽象的、整体性的思考,

如“人是什么”之类的形而上学问题,而是关注一些具体的有关人的事实,如性、监禁、疯癫等,以便从经验性、历史性的事实中得出有关人的真正认识。

通过对什么是启蒙,什么是现代性的反思,以及对康德与启蒙的批判精神的肯定,福柯最终的落脚点放在了对自己的哲学思考模式与质疑方法同启蒙精神,亦即现代性的“态度”的接续上。这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福柯本人有关现代性的评价立场,它与后现代主义的否定现代性的立场(如利奥塔将现代性视为一种“元叙事”,而将后现代主义界定为“反元叙事”)是不同的。从实际的情况看,福柯本人不仅没有介入有关现代性的论争中,而且还对思想界所提出的有关现代性的问题感到些许茫然和踌躇。因为他坦言自己从来都不很了解在法国“现代性”这个词到底讲的是什么东西,针对的是什么问题,包含的是什么意思,并且也不知道“人们所说的后现代性是什么”,这些现代主义者与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者之间有什么异同。由此可见,福柯本人并不怎么关注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其后现代性理论。因此,把他归入“后现代主义”的范畴,属于后人对福柯思想的诠释之所为,而并非福柯本人明确的意识指向。

二、“未崩溃的”现代性的合理性

关注与反思启蒙对当代哲学的重要意义,自然离不开对“理性”的性质及其历史作用的思考。在福柯看来,自18世纪以来哲学和批判思想的核心问题一直是、今天仍旧是、而且他相信将来依然是:我们所使用的这个理性究竟是什么?它的历史后果是什么?它的局限是什么?危险又是什么?在他看来,对“理性”进行反思,追问它的历史,包括它的走向成熟,使主体无需他人的监护,能够达成自律,并进而评价理性对世界的“统治”,这样的追问与评价是在继续追随康德的“什么是启蒙”的问题。他并且认为,19至20世纪的现代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转向了康德的这一问题。

从总体立场上看,应当说福柯对理性持的是一种偏属“中庸”的态度,即反对对理性采取一种非此即彼的做法,既不作单纯的否定,也不作单纯的肯定。他称那种对理性采取非此即彼的极端态度是“讹诈”：“人们经常讹诈整个理性批判或讹诈批判性的思考:要么接受理性,要么堕入非理性主义。”^{[4](P494)}因此,他一方面不赞成对理性持一种极端的否定态度,因为那种要把理性视为必须予以消灭的敌人的观点,是极端危险的;另一方面,

他认为同样极端危险的是,把对理性进行任何批判性的意图,都视为会使我们陷入非理性的危险之中。

这里,我们先来看看福柯对理性的批评。这方面,他主要不满于理性的“专断”,认为在18世纪的理性主义的“革命”理想中,理性扮演的是“专断”的角色:“理性,犹如专断的光芒。”^{[1](P425)}这种专断的表现,从福柯的有关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既表现在笛卡尔对事物进行普遍的怀疑中,独独把理性排除在怀疑的对象之外,把它看作一个自足、确定无疑的思维的基础与出发点;也表现在它对待非理性的压制态度上,尤其是在历史上对“疯人”所采取的不择手段的、乃至是很残忍的手段,包括“烧灼术、切口排液、制造表皮脓疮和注射疥疮液”等;并且在现今还表现在以理性为标榜的西方文化、科学和社会组织中,要求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普遍有效性。

不过,虽然福柯对理性的专断、对它的压制非理性有着尖锐的批评,但从根本上说他似乎还是对理性持一种肯定态度的,这集中表现在他肯定理性所具有的“自我创造”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体现在科学文化、技术装备、政治组织等方面的“合理性”形式,即从理论到实践,从观念到制度的各种各样的建立,各种各样的创造,各种各样的变革。“正是通过它们才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合理性。”^{[1](P495)}他明确表示自己所感兴趣的正是这些合理性的形式,因为它们体现了人类对于自身的关注。为此,他一直致力于对这类合理性形式的分析。他认为,从韦伯到哈贝马斯,不断被反复提出的是如下这些相同的问题:“理性的历史是什么?理性的统治是什么?理性的统治通过哪些不同的形式起作用?”^{[1](P492)}而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关于在政治、社会与文化各领域的治理的合理性的问题,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明确合理性的形式,使合理性的形式占据统治地位”^{[1](P494)}。他认为,现代社会的这些合理性形式,在某一确定时期,如我们所处的时代,支配着知识的类型、技术的形式和政权统治模式。因此可以说,“在这些领域的运转中,合理性的地位是很重要的”^{[1](P502)}。

针对一些否定现代性的合理性形式、认为它们在知识的类型、技术的形式和政权统治这些领域中正在崩溃和消失的观点,福柯明确给予批驳。他宣称自己看不到有这样的消失,并且也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来支持这样的论调。相反,他断言现代性的这些合理性形式并没有崩溃和消失,而是

通过一些变革,使新的合理性不断地产生。针对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理性与现代性是一个叙事,但现在已经结束,另一种叙事将代之而起——福柯声言这样的主张是“没有意义的”^{[1](P502)}。

在对合理性的分析中,福柯声称他所努力要摆脱其影响的是这样两种模式:一是现象学的,它认定存在着一个理性的本质的基础和计划,断言现实中人们由于对此有所遗忘,因此才发生了对这种理性本质的基础和计划的背离;另一是马克思主义与卢卡奇的,它们肯定合理性的存在,并把它等同于理性本身的形式,但同时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环境的影响,使得合理性产生了危机,最终造成了合理性的遗忘和非理性的堕落。

福柯并不赞成这两种他所谓的有关合理性的解释模式,在这方面,他为自己提出的问题是:“人类主体怎样使自身成为知识之可能的对象,通过哪些合理性形式,通过哪些历史条件,以及最后,付出了什么代价?”^{[1](P496)}具体说来,福柯尝试去分析的有关合理性的问题域,其一是“疯癫”的问题,是什么导致了理性对疯癫的统治,使得疯癫者只能生活在沉默之中;人们怎样才能说出生病(疯癫)的主体的真实,或者说,疯癫的主体的真实性何在?其二是有关话语主体、知识的主体的真实性问题,他们是先于语言而存在的,构成语言所有意义的本源,或者本身仅仅是话语“构成规则”的条件的产物?其三是关于罪犯与惩罚的问题,自我之所以成为犯罪主体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最后,还有性的问题的研究,在性成为社会对主体进行规训化控制的一个工具之后,主体怎样才能说出关于自我作为性快感主体的真实?

在对上述问题作出自己的解答时,福柯的合理性理论表现出如下的一些特点。

首先,福柯强调制度性的因素在合理性问题上的影响。在提出这样的问题:“通过什么代价主体才可以说出关于自我的真实,又通过什么代价主体才可以说出关于自我之作为疯子的真实”之后,福柯紧接着指出:“在所有这些复杂的、重叠着的东西中,您可以看到一种制度的游戏:阶级关系、职业矛盾、知识模式乃至整个历史以及主体和理性都参加了进来。”^{[1](P496)}也就是说,在他的研究所涉及的规训与惩罚、知识与权力、自我与性等问题域,其合理性问题在根本上都是属于制度方面的游戏。不过,福柯这里所使用的“制度”一语是广义上的,它除了包括通常所指涉的阶级关系之外,还包括“知识模式”等方面的内容。

其次,是突出合理性概念与权力的关系。“权力”是福柯现代性理论的一个聚焦点。不论是在研究“现代主体的系谱学”,还是研究现代的“规训社会”,福柯把各种各样的自我、性、知识、惩罚、规训等现象,都归结为“权力”运作的产物,把形形色色的社会控制都还原为权力的功能。他断言,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并且当社会变成科学研究的对象,人类行为变成供人分析和解决的问题时,这一切都与权力的机制有关,甚至人文科学在他看来也是伴随着权力的机制一道产生的。同理,在合理性问题上,福柯一样强调合理性形式与运转着的包括统治、知识和技术等权力形式是互相关联的,在这里存在着合理性形式与权力形式这两种形式的交换、传导、迁移和相互影响^{[14](P505)}。他指出,有关权力对某种类型的合理性产生影响的问题,在西方自16世纪以来,特别是在当代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那里,人们就对这种合理性进行了广泛而持久的思考。而对他本人而言,福柯明言在思考诸如“主体如何能够说出关于自身的真实”这样的问题时,“权力关系是我试图分析的诸联系中的决定性要素^{[14](P506)}”。

再次,福柯在合理性问题上注意到的是它与偶然性的关系,是在偶然之中来把握必然性。他认为,在合理性问题上可以求助于历史,但这是在一定限度的范围内才是有意义的。因为,历史的作用在于表明正存在着的东西在过去并不总是存在,这意味着“事件总是在碰撞和偶然的汇合处、

在脆弱的、不确定的历史线条上出现的”。因此,合理性是在“这张偶然之网上浮现出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合理性形式是非理性的,相反,合理性形式是以人类实践和人类历史为基座的。各种不同的合理性形式对于这些事件来说,是通过偶然的事件而展现出来的,不过它们最终又是表现为一种必然性的形式。这里,福柯对必然与偶然的看法,颇有黑格尔的辩证哲学的味道。

最后,是合理性的代价问题。在上述有关合理性的论域中,福柯经常提及的是合理性的“代价”问题,这表明了他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这里“代价”的意思是,在理性的历史上,人类对这些论域的合理性的认识与把握是经历了曲折与错误的,这包括错误地对待实际上是心理病人的疯子,在古典时期甚至把他们与罪犯一起监禁,等等。用福柯的话来说,“这个代价是使疯子成为绝对的他者,它不光是理论上的代价,而且还是制度上的代价乃至经济上的代价。例如建立精神病学以确定疯子^{[14](P496)}”。这里所谓的“他者”,指的是与理性相对立的东西。

与福柯的理论思考的总体风格相一致,在合理性问题上,他给出的更多是质疑、揭露、批判,而不是正面地回答某一领域中的合理性是什么。这意味着福柯通过解释相关的合理性在历史上付出的代价,为人们留下的更多地是对建立有关论域上的合理性的思考。似乎可以作出这么一个比方:福柯是一个善于诊断的医生,但却不精于治疗。

参考文献

- [1] 福柯. 什么是启蒙[A]. 汪晖等主编. 文化与公共性[C]. 北京:三联书店,1998.
- [2] 福柯. 康纪莱姆《正常与病理》一书引言[A]. 福柯集[C].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 [3] 福柯. 米歇尔·福柯访谈录[A]. 福柯集[C].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 [4] 福柯.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A]. 福柯集[C].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李小娟 付洪泉]

The Significance of Enlightenment and the Rationality of Modernity ——Foucault's "Attitude towards Modernity"

CHEN Jia - ming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Foucault regards the essence of modern philosophy as the answer to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the basic sense, he adopts a kind of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enlightenment and believes it is significant to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As to the "attitude" or "qualities" of modernity, Foucault attributes it to a kind of "Philosophical query", that is, a quality of "inquiries critically addressed." Although he is not satisfied with the arbitrary act of "reason" and criticizes it for its oppression of irrationality, he affirms the "self-creativity" of reason and the "rational" form embodied in the aspects such as science and culture, technical equipment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 Foucault's theory of rationality has its own uniqu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Foucault; enlightenment; modernity; rationality